

云冈不同时期的景观与云冈堡的修建

刘天歌¹ 杭 侃²

(1.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2. 云冈研究院、山西大学云冈学研究院)

摘要: 自北魏时期始凿石窟以来,不同时期的开凿与营造不断改变着武州山山体面貌和周围景观。本文结合武州山及周边地理环境、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探讨北魏至明清云冈石窟景观,由北魏时期以昙曜五窟为中心、山下石窟与山上寺院相结合,到辽金时期在窟前加盖木构佛寺并改拨河道、形成新的区域划分,再到明代因军事防御需求修建云冈堡,石窟的宗教活动有所衰落、寺院重心转移至 5~8 窟区域。

关键词: 云冈石窟 石窟景观 云冈堡

Abstrac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grotto construction in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the excavation and construction in different periods continued to change the appearance of Mount Wuzhou and the surrounding landscape. This paper combines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of Mount Wuzhou and its surroundings, documentary records and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to explore the landscape of Yungang Grottoes from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to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the five grottoes of Tan Yao were the center and the grottoes at the foot of the mountain were combined with the monasteries on the mountain. In the Liao and Jin Dynasties, wooden Buddhist temples were added in front of the grottoes and the river was redirected to form a new regional division. Then to the Ming Dynasty, Yungang Fort was built for military defense needs, which led to the decline of religious activities of the grottoes, and the center of the monasteries shifted to the area where 5~8 grottoes were located.

Key words: Yungang Grottoes Landscape of the grottoes Yungang Fort

云冈石窟位于山西省大同市西 16 公里的武州山南麓,武州川水从石窟前流过,酈道元《水经注·澧水》中对云冈石窟的记述为:“其水又东北流注武州川水,武州川水又东南流,水侧有石祗洹舍并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其水又东转径灵岩南,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

云冈石窟位于武州川的二级台地上,石窟前的道路是从大同通往左云,前往内蒙古和林格尔地区的交通要道。武州山军事地位重要,所以武州山一带很早就有军事性的防御堡垒。《史记·匈奴传》:元光二年(前 133 年),匈奴“以十万骑入武州塞”;唯不详此武州塞的具体位置。酈道元《水经注》卷十三引《魏土地记》曰:“平城西

三十里,武州塞口者也。”根据所记之里数,则《魏土地记》所说的武州塞口,大致在今天云冈石窟分布的范围内。

历史上的云冈峪的寺院范围很大,《续高僧传·昙曜传》记:“龕之大者,举高二十余丈,可受三千余人,面别镌像,穷诸巧丽,龕别异状,骇动人神,栴比相连,三十余里。”云冈石窟现存大小窟龕 254 个,主要洞窟 45 个,石雕造像 5.9 万余尊,东西绵延 1 公里(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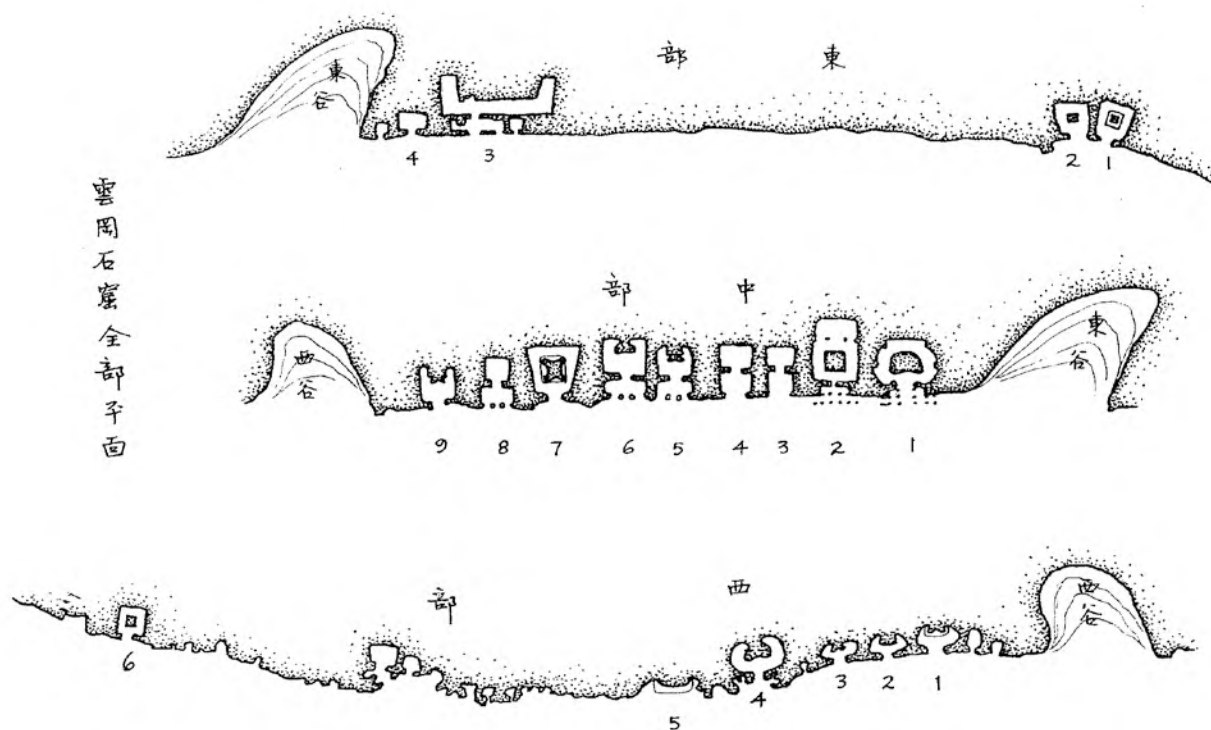
石窟的开凿和不同时期的营造,不断改变着武州山山体的面貌,形成了云冈石窟不同时期的景观。

云冈石窟集中分布的区域有两条自然冲沟,比较大的龙王沟位于第 4 和第 5 窟之间,又被称为“东谷”,龙王沟上的山顶建有龙王庙,龙王庙



图一 云冈石窟全景

(采自〔日〕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云冈石窟:公元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学调查报告》第一卷,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云冈刊行会,1952年,图版1)



图二 云冈石窟平面图

(底图采自梁思成、林徽音、刘敦桢:《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3年,第四卷 第三·四期合刊,第184页,插图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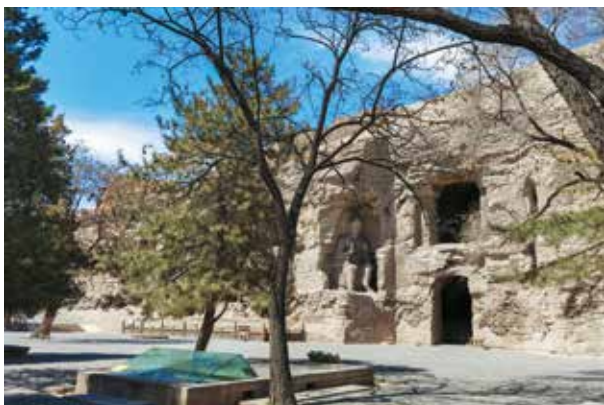
西侧进行过发掘,清理三座房屋遗址,出土物主要有辽代生活用瓷以及有“西京仁和坊”戳记的辽代澄泥砚^[1],说明辽代在龙王沟西侧建有僧人活动和居住的建筑。

另外一条冲沟位于第13窟和第14窟之间,又被称为“西谷”。由于两条冲沟的存在,将云冈石窟所在的区域自然划分为东、中、西三段,最

早开凿的昙曜五窟位于西段的东部,而中段的第5至13窟,主要开凿于云冈第二期。东段的第3窟为云冈最大的洞窟,惜未完成,一般认为是由于迁都洛阳的原因导致了第3窟的停工。第1、2窟为一组双窟,位于云冈石窟的东端,离开第3窟有一段距离,第4窟东邻第3窟,西临龙王沟,规模并不大,也未完工,但窟内有北魏正光年间



图三 山前古代道路遗迹



图四 古河坝（前玻璃罩内）与石窟崖面关系

的题记，与云冈石窟开凿工程“终乎正光”的记载可以相互印证（图二）。

在河流的二级阶地上开凿石窟，既可以利用河流阶地作为交通的道路，又可以节省石窟开凿过程中“斩山”的工作量。云冈石窟前有两处遗迹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原来的河流和道路情况，一处是在第 2 窟和第 3 窟之间，紧贴着山体有古代的车辙痕迹，向南两米多就是河流故道（图三）；另外一处是在昙曜五窟南 25 米左右，1993 年的窟前遗址发掘中，发现有古河道的遗迹（图四）。

我们根据上述两处遗迹和文献记载，大致可以复原云冈石窟金代以前的河床和道路。金代的《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曾经记载金代初期治理河道的情况：“本朝天会二年，大军平西



图五 云冈第 16~20 窟（昙曜五窟）全景旧貌

（采自〔日〕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云冈石窟：公元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学调查报告》第十一卷，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云冈刊行会，1953 年，图版 2）

京，故元帅、晋国王到寺随喜赞叹，晓谕军兵，不令侵扰；并戒纲首，长切守护，又奏，特赐提点僧禅紫衣，并通慧大德号。九年，元帅府以河流近寺，恐致侵啖，委烟火司差夫三千人，改拨河道。”现在武州川水远离石窟所在的崖体数百米，当是金代改拨河道的结果，这次改拨河道，对云冈石窟所在区域的景观影响比较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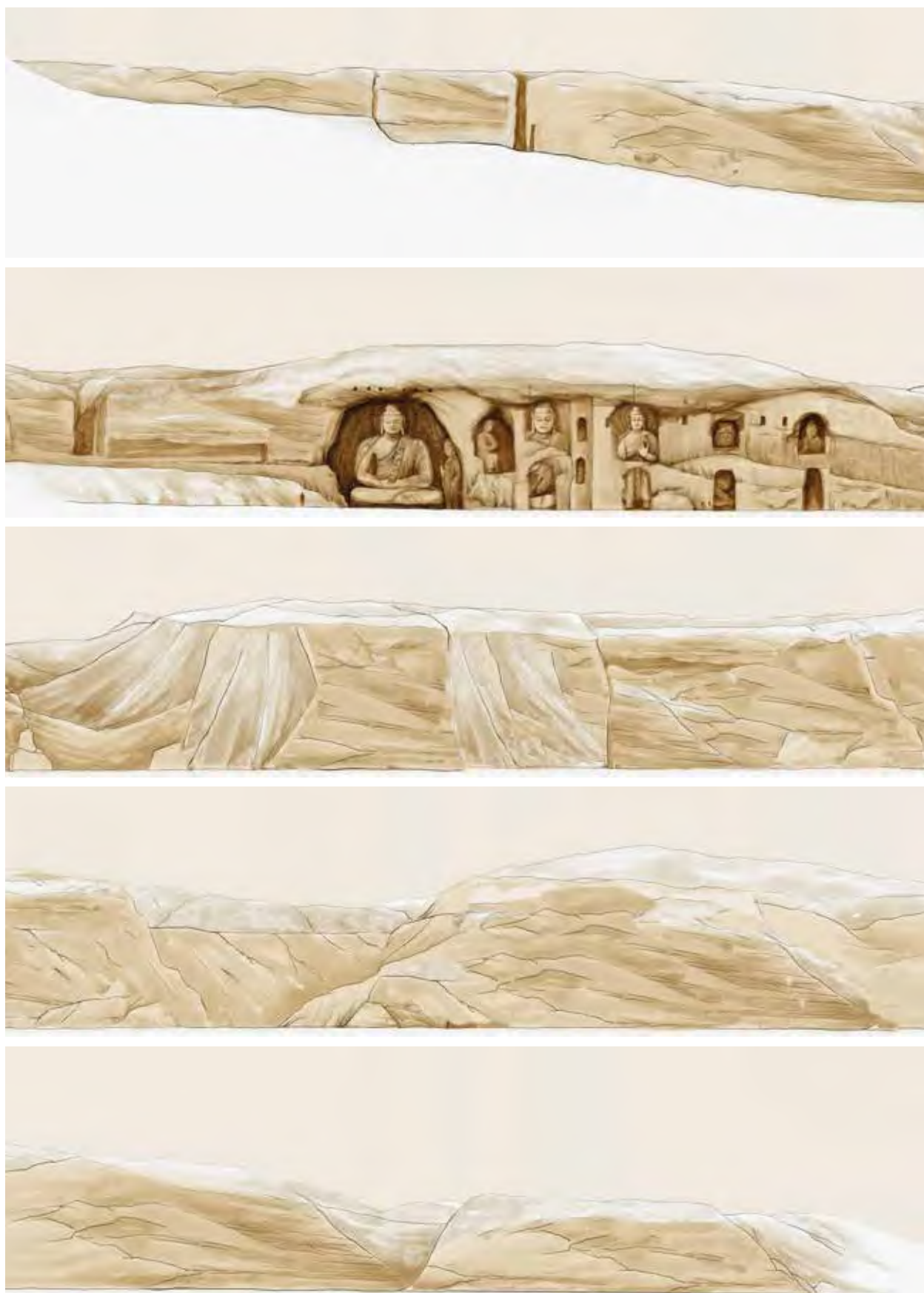
北魏文成帝和平元年（460 年），“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图五）^[2]。

昙曜选择最先在武州山开凿石窟的地方，一定是云冈微地貌最佳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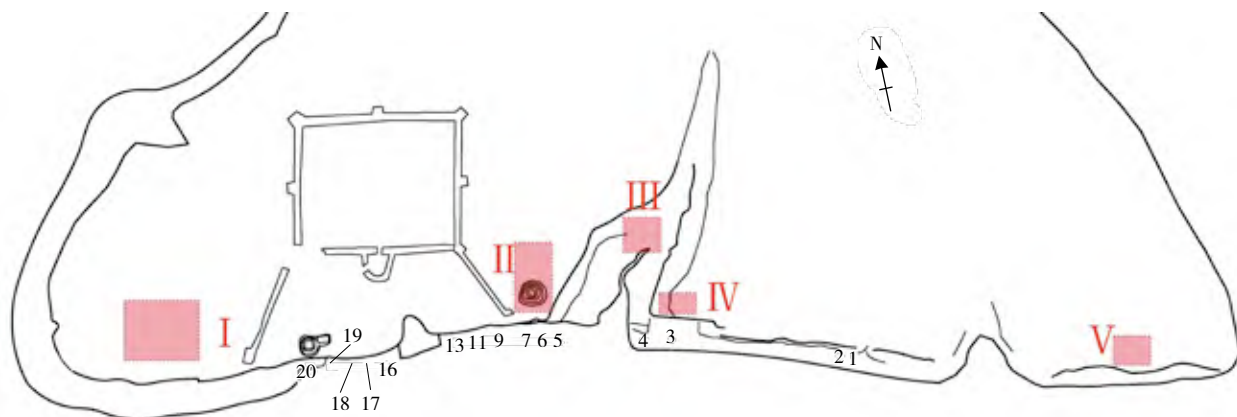
“云冈石窟开凿在侏罗纪的厚层砂岩中，该砂岩为黄褐色并夹有紫色砂质页岩。岩石的主要成分为长石和石英，胶结物多含钙质和泥质，岩体交错层里发育岩性纵横不一。云冈石窟的岩层厚约 40 米，东西两段逐渐减薄。岩性变化规律大致是：上部石英含量多，东段长石含量多，因此这层砂岩上部比较坚硬，下部比较疏松；中西段比较坚硬，东段比较疏松。”^[3]

从云冈石窟造像的现状看，昙曜选择开凿石窟的地点，是武州山山体岩石最好的地方，同时也是武州川前道路最开阔的地方。

昙曜开凿的五座洞窟形制上共同特点是摹拟椭圆形的穹庐形式，杨泓先生认为这种形式乃仿照游牧民族的毡帐^[4]，窟内造像主要是三世佛（过



图六 昙曜开凿五窟之后的武州山景观示意图（赵献超制图）



图七 云冈石窟窟顶发掘区域示意图

(区域 I, 北魏寺院遗址; 区域 II, 北魏、辽金塔基遗址; 区域 III, 辽代寺院遗址; 区域 IV, 北魏建筑遗址; 区域 V, 北魏塔基遗址)
(采自彭明浩:《云冈石窟的营造工程》, 文物出版社, 2017 年, 第 34 页, 图 2.8)

去、未来、现在), 主佛形体高大, 占据窟内主要空间。在具体的施工中, 由于洞窟规模大, 所以都开凿有明窗, 一期洞窟的明窗明显大于窟门, 明窗除了具有运输石料的功能, 还影响到石窟的观看方式, 因为一期洞窟(昙曜五窟)的窟内没有礼拜空间, 而明窗又很大, 说明昙曜五窟原来是从外面进行观瞻的, 结合金代改拨河道之前的河岸位置, 可以看出明窗的大小和观看的视域之间是经过设计的, 由此我们也可以推测, 昙曜五窟在设计之初, 窟前没有其它木构建筑(图六)。

如果这种推测成立, 那么对于《水经注》里所记云冈石窟“凿石开山、因岩结构, 山堂水殿, 烟寺相望”的理解, 结合当时窟前和云冈窟顶的发掘情况(图七), 知道现在云冈堡的东西两侧都有北魏时期的寺院遗址, 所谓的“山堂水殿, 烟寺相望”, 应该理解为石窟和山顶的寺院相结合, 山堂指山顶的寺院, 水殿并非实有, 而是石窟和山堂倒影在武州川水中的景象。

《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对云冈石窟的开凿历史进行了考证, 其直接的文献来源应该是当时寺院中能看到的两块碑刻: “今寺中遗刻所存者二: 一载在护国, 大而不全, 无年月可考。一在崇(教)[福], 小而完, 其略曰: 安西大将军、散骑常侍、吏部内行尚书、宕昌[公]钳耳庆时镌也。[因]岩开寺。其铭曰: 承藉口福, 遮邀冥庆, 仰钟皇家, 卜世惟永。盖庆时为国祈福之所建也。

末云: 大代太和八年建, 十三年毕。”所谓的护国和崇福寺是云冈十寺中的两座寺院, “西京大石窟寺者, 后魏之所建也。凡有十名: 一通(示)乐, 二灵岩, 三鲸崇, 四镇国, 五护国, 六天宫, 七崇(教)福, 八童子, 九华严, 十兜率”^[5]。云冈窟前发掘的过程中发现有辽代大规模的建筑遗迹^[6], 但这十座寺院如何与洞窟对应, 学者们有不同的认识,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辽代窟前建有规模宏大的寺院建筑, 这些辽代的建筑在金初的战火中遭到毁坏, 金代再次重建了云冈窟前的寺院建筑, 《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对于这段历史的记述为: “唐贞观十五年, 守臣重建。辽重熙十八年, 母后再修; 天庆十年, 赐大字额; 咸(熙)[雍]五年, 禁山樵牧, 又差军巡守; [寿]昌五年, 委转运使提点; 清宁六年, 又委刘转运监修。李唐以前, 虽无遗迹, 以近推远, 从可知也, 此则历年之大略也。”

宿白先生还曾经对唐代云冈的情况做过详细的考证, 宿白先生结合文献认为云冈第 3 窟中的一组大像雕凿于唐初^[7], 但唐代云冈石窟前的状况我们无法确知。从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看, 我们可以确定辽金时期均在云冈石窟前建造有寺院, 这种状况就使得辽金时期的云冈景观和北魏时期有很大的不同。

由于北边屡遭蒙古势力侵扰, 明王朝决定在云冈修筑云冈堡。据云冈研究院所藏嘉靖四十三

年(1564年)《重修云冈堡记》碑:

“古者,石佛寺通西四卫道也。于嘉靖三十七年,内为右卫饷道,改□云冈堡,设操守一员,把总二员,坐堡一员;召募官□五百名。所以保障地方、转送粮饷甚便。是我□巡抚杨爷、镇守张爷垂恩,而民沾其泽也。累年风雨推坏,操守吴公殚厥心思,随其规模,委把总陈公,用本堡军士河南运土,修造堡门一□、□楼一座;筑堡东面敌台三座,上盖城楼□间;修公馆二所;修塌堡墙一面,周围栏□墙,挑洗壕堑;修盖披塌营房百间,改□□装,什物鲜明;要路挑挖,赚窖三百余个;□飭火路烽[候]、墩台十座。”

张焯先生对明代云冈堡的修筑情况进行了考证,概言之,云冈石窟由于明代云冈堡的修建而得名,云冈堡分下堡和上堡,分别建于嘉靖和万历年间,两堡之间并有堡墙相连。现在,云冈下堡仅存部分垣墙,云冈上堡基本保存完好。张焯先生还认为嘉靖之前武州山就建造有军事性的堡垒石佛寺堡,故嘉靖碑记云冈堡是“累年风雨推坏”之后的重修^[8]。

石佛寺堡筑于何时,诸书没有记载。按明成化十年(1474年)《山西通志》卷三《关塞》记:“石佛寺口,在大同府城西三十里,左卫东一百里,有墙堡。”所以,明正德八年(1513年)成书的《大同府志》卷二《土堡·续设》中,列有“石佛寺堡”。所谓“续设”,当为继续以前堡垒,同卷《关塞》曰:“石佛寺口,在府城西三十里,左卫东一百里,有墙堡。”

石佛寺堡的建造乃出于军事防御的目的,但也设有交通驿站。明成化《山西通志》卷四《驿递》:“大同行都司十三铺,俱三十里至。……西路七:石佛寺铺、高山站铺、左卫北门铺、牛心站铺、右卫在城铺、双山儿铺、威远在城铺。”

云冈石窟所在区域元代是否有军事性的防御设施不详,金代在云冈创修有五百余步的石墙。考虑金代云冈一带的景观时,需要考虑这道石墙:“先是,亡辽季世,盗贼群起,寺遭焚劫,灵

岩栋宇,扫地无遗。皇统初,缙白命议,以为欲图修复,须仗当仁,乃请惠公法师住持。师既驻锡,即为化缘。富者乐施其财,贫者愿输其力,于是重修灵岩大阁九楹,门楼四所,香厨、客次之纲常住寺位,凡三十楹,轮奐一新。又创石垣五百余步,屋之以瓦二百余楹。皇统三年二月起工,六年七月落成,约费钱二千万。自是,山门气象,翕然复完矣。”

按此段《金碑》的语意,这段五百余步的石垣应该在灵岩大阁的周围,五百余步的石垣不足以将云冈石窟现在的区域都包括在内,则金代云冈石窟所在区域应该已经有了新的区域划分。

云冈下堡在民国时期尚为完整,现仅存南城墙的东段之部分。明代万历二年(1574年)云冈上堡的建造对于今天云冈石窟景观的影响最大。万历所建之堡城至今保存基本完整,呈长方形,南墙中央开门,外筑瓮城;东南、西南二角各有向南斜筑的土墙,呈“八”字型分别延伸至第9窟、31窟崖顶,以屏护上下二堡间的联系。值得探讨的是八字墙的东段并没有选择修筑在“西谷”的位置,而是选择了在8、9窟之间,由此连接下堡的东墙,将8窟以东和9窟以西划分为两个区域。8窟以东和“东谷”以西,大致可以第五窟为中心,东西对称,这一区域在明代的云冈堡外,是宗教活动的区域,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云冈石窟的老山门是以第5窟为轴线了。长广敏雄在《云冈日记》中写道:“石佛寺以第5、6窟为中心,大体上具备木造楼阁、僧侣宿泊的僧房,以及其它伽蓝建筑。以五华洞西端土墙为界,以东是伽蓝寺庙院。因而把第14窟以西的昙曜五窟,以至更远的西方窟群看作是神圣区域之外,变成农民们利用的场所。是难以言喻的荒芜村落。……傍晚,变得寂静了。石窟成为野鸠和蝙蝠的栖息场所,到处都是野鸠的屎,弄脏了佛像,已堆积了几百年。……几百年以来,农家长期利用石窟做土房,从不感觉到心痛。石窟从很早以前就不再是宗教圣地。”长广敏雄先生看到的情景,应该是清初云



图八 云冈第 9~13 窟及云冈堡东八字墙旧照

（采自〔日〕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云冈石窟：公元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学调查报告》第八卷，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云冈刊行会，1953 年，图版 1）

冈堡被废为民堡后逐渐形成的状况，清雍正《朔平府志》卷八《武备》曰：“云冈堡，建于前明嘉靖三十七年，万历甲戌改建于冈上，周一里四分零，高连女墙三丈五尺。地近腹里，无分管边墙，止设火路墩八座，今裁并。”

可以想见明代因为边防有警，在嘉靖和万历时期修筑云冈上、下堡的时候，对于云冈石窟所在区域的景观会造成很大的改观。从老照片（图八）可以明显看到云冈堡东面的八字墙选择在第 8、9 窟窟顶的位置，而非西部的冲沟，说明在修筑八字墙的时候，当时的寺院重心已经在中段东部的第 5、6 和 7、8 窟区域了。云冈第 5 窟的主尊是云冈石窟中最为高大者，高逾 17 米。关于云冈第 5 窟的年代，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杭侃认为第 5 窟并不是连续施工完成的^[1]，它开凿于献文帝时代，上接昙曜五窟，同样是马蹄形平面、穹庐顶的大像窟，窟内主要是三世佛，主尊与昙曜五窟一样，占据了窟内大部分空间，这大概也是后代将第 5 窟作为中心设置山门的原因。

- [2]（北齐）魏收撰，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魏书》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中华书局，1974 年，第 3037 页。
- [3] 解廷凡：《云冈石窟的加固与保护》，《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一）》，文物出版社，1991 年，第 202 页。
- [4] 杨泓：《从穹庐到殿堂——漫谈云冈石窟洞窟形制变迁和有关问题》，《文物》2021 年第 8 期，第 62~80 页。
- [5] 宿白：《〈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新发现的大同云冈石窟寺历史材料的初步整理》，《中国石窟寺研究》，三联书店，2019 年，第 51~78 页。
- [6] 姜怀英、员海瑞、解廷凡：《云冈石窟新发现的几处建筑遗迹》，《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一）》，文物出版社，1991 年，第 198~201 页。
- [7] 宿白：《恒安镇与恒安石窟——隋唐时期的大同和云冈》，《中国石窟寺研究》，三联书店，2019 年，第 168~180 页。
- [8] 张焯：《云冈筑堡与古寺衰微》，《敦煌研究》2007 年第 6 期，第 7~12 页。
- [9] 杭侃：《云冈第五窟刍议》，《石窟寺研究》第八辑，科学出版社，2018 年，第 53~63 页。

[1] 赵曙光：《龙王庙沟西侧古代遗址清理简报》，《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二）》，文物出版社，1994 年，第 219~230 页。